

科学与人文的划分,是在工业文明占据统治地位以后才出现的事情。

玉渊杂谭》》

国语差赖不着学外语

乐享悦读》》

文·唐宝民

文·句艳华

近日,一向敢想敢说的前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在微博上大力反对娃娃英语,认为应该取消小学英语课,如此才可以增长孩子们对国语学习的爱好和时间、精力。听众们之中的正方反方立刻就此争论不休。如今能引起共鸣和争鸣的,教育话题绝对是一个。这里也想掺和几句。

王旭明后来更正说,他并不是反对学习外语,而是反对强迫娃娃学外语。但看他的观点,立足点还是在英语削弱了母语和传统文化教育。他这么讲,一是现在的英语教育制度实行多年以来,已显露出不少弊端;二者,多少也与如今传统文化的回归有关系。

王旭明所指有理,长期以来,对英语学习的重视和对语文教育的轻视这两种现象的同时存在,确实造就了不少母语水平偏低,但英语水平也未必高明的学子,这显然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双输之举。

但是,因为英语教育长期以来的弊端受人指责,王旭明作为一位颇有些影响的公众人物,出此极端言论,很容易产生误导,助长一些思想保守之人对英语学习的反对,也就是矫枉过正。

个人认为,母语水平和传统文化的“失继”,和重视英语学习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,充其量也只是原因之一。这里大胆断言,即使从今后高考不再考英语,甚至取消英语课程,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甚至高校对语文教育的轻视,短期内并不会因此发生大的改变。这其中有很多原因,从上世纪以来对传统文化的“非礼”,以及由于国家建设所需而形成的重理轻文“传统”是其一;再者,语文教育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造成了学生语文水平不高;更重要的一点,是整个社会彻底的功利化,重投机严重侵蚀了教育。

我曾经做过这样的设想,假如我们国家全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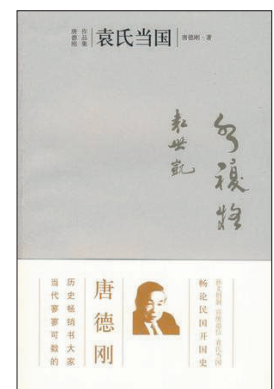
英语水平都能达到自如阅读英文书报的水平,那国家的面貌必然为之大变。首先,它代表我们的教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,其次,说明我们的公民素质已经相当之高。可以想见,那样一个社会,人们必然关心世界,对不同的文化产生包容心。因为可以吸收不同文化的营养,社会空气定会开放、开明,善于学习他族所长的同时,也必然具有文化自觉。举个例子,新文化运动时期那些领袖们,极端者甚至主张全盘西化,但个人生活和礼仪却是相当中国式。

正因为目前英语教育存在的问题,所以英语学习不仅不应该弱化,反而应该加强。当然,这种加强,应该是针对上一阶段英语教育出现的弊端进行的改革,提高其质量。其内容,包含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方式和理念,也包括考核方式。只要在升学上做文章,娃娃们并非不能接

触一点简单的英语。在成人升职上的英语考核上,也应该适度弹性。人才的专与博,一直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。但一个好的社会,应该是各种人才都有用武之地。用外语水平去评价一个考古学家,拿数学题去考钱锺书,是很没必要的,很不得要领的。所以,如艺术、文学、考古等这种和外语水平关系不太大的专业,应该灵活处理对其从业人员外语水平的要求。

不过客观地说,逐利是人的本能之一。在升学大业和继承传统文化两者之间,家长和学校很难做到不“短视”,这就需要教育部门站出来。假如现阶段将教育完全拖出应试的泥沼中,还具有相当大的难度。那么,不妨就继续利用考试这个“指挥棒”,增加对语文水平的考核,让学生、家长、学校这三个“拜分”的群体走出重此轻彼的现状,两种语言的学习,原就可以不产生矛盾。

以史家立场 评说“窃国大盗”



在中国近代史上,袁世凯是臭名昭著的反面典型,“窃国大盗”“野心家”“卖国贼”……早就听说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写过一本关于袁世凯的书——《袁氏当国》,那么,唐德刚笔下的袁世凯是什么样呢?

唐德刚先生作为历史大家,他的《胡适杂忆》、《胡适口述自传》、《晚清七十年》等都已经成为史学经典,之所以如此,与他严肃认真的治史态度有极大关系。这本《袁氏当国》,也处处体现了他这种坚持。纵读全书,所论述的每段史料、每个细节,都不是空穴来风,都是作者在对相关史料大量研读的基础上得出的判断,史料的参考来源,也不是野史轶闻之类的戏说,而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权威著作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,他在引述史料之后,还在史料后面注明出处,不但写明了史料原载书籍的书名,而且连页码都标注得清清楚楚,其认真态度由此可见一斑。我大致统计了一下,在这本仅209页的“小书”中,所参阅的史料竟达一百多种,足见其下的工夫之深。

唐德刚在写作本书时虽然引述了大量资料,但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。比如,对于辛亥革命,很多学者认定其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,开创了民主和共和”,但唐德刚认为:“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后,那有数千年历史的‘帝制’,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了,但以后的中国历史要进入真正的‘民治’时代,还要有很长一段时间,才能慢慢地转化过来。”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是:“蔡锷发动云南起义,推翻了袁世凯的统治。”但唐德刚经过考证得出:蔡锷发动的护国战争,只是一个泡沫战争,没有什么实质作用。真正促使袁世凯倒台的,是袁世凯北洋系班底的窝里反,“总之,冯、段(冯国璋、段祺瑞)二人,乃袁世凯的两大股肱也。折其一,袁氏的皇帝肯定就做不成了;两个同时罢工,袁就瘫痪了,云南起义也就是多余的。”

对于袁世凯这样已为千夫所指的人物,论述时一不小心就容易感情用事,而唐德刚则是以极冷静、极客观的笔法对袁世凯进行评价。比如,关于“京津兵变”,历来认为是袁世凯一手策划的,但唐德刚认为:“另据各方目击者记录,以及后来历史学家吴相湘教授等的严密考证,皆一致认为是非袁之预谋。”再比如,宋教仁遇刺一案,主流说法多年来一直认为其主谋是袁世凯,但唐德刚给出的结论是:袁世凯确有杀宋之心,但并没有下最后的决心,刺杀行为,应该是国务总理赵秉均指使的,袁世凯并不知情。袁世凯遭袁万年后,关于他的私家道德,被描述得一团糟,说其贪财、好色、荒淫无度……但唐德刚对袁世凯的评价却是:“其为人也,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,然亦雄才大略,知人善任,不治私产。虽妻妾众多,然并不沉湎于酒色。”

也有两点遗憾:一是,百年以来,史家一直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是袁世凯出卖的结果,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,本书却中只字未提。读本书之前,我一直想看唐德刚对此事的看法,可惜没能看到;二是,关于宋教仁遇刺案,唐德刚认定国务总理赵秉均是主谋,未免失之武断,因为,根据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资料分析,革命党内部人员亦有嫌疑,不能排除国民党人为发动二次革命制造借口,不惜自编自导苦肉计,对宋教仁下黑手。

文·杨雪

科林碎语》》

文·林之光

蜀犬吠月

读者一定以为我把题目写错了,从来“蜀犬吠日”么!

其实不是,我以为蜀犬其实更应吠月。

“蜀犬吠日”成语出处可以追溯到唐代柳宗元的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。即这是柳宗元给韦中立的回信。信中说,“仆往闻庸蜀之南,恒雨少日,日出则犬吠,余以为过言。前六七年,仆来南,二年冬,幸大雪逾岭,被南越中数州,数州之犬,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,至无雪乃已,然后始信前所闻者”。

他是说,以前听说蜀犬会吠日,他认为言过其实。但是六、七年前他来到永州,即今湖南零陵,第二年冬大雪,南越(同粤,指今两广)几个州的狗都狂奔吠雪,于是才信“蜀犬吠日”。其实,他是根据“粤犬吠雪”这个事实(因为那时他虽还没任柳州刺史,但当时永州辖区也包括今广西西北部地区),推出了“蜀犬吠日”的错误结论。因为四川盆地虽是我日照最少的地区,每年平均也有1000-1500小时的日照,即使最阴的川西雅安地区也有约800小时,雅安最阴的秋季每天平均也还有1.6小时的日照,绝不至于大见了太阳就吠叫的。我去过四川多次,也问过许多四川人,他们都认为只是一种形容而已。

“蜀犬吠月”是我推理出来的。因为四川盆地,特别是川西雅安地区,是我国云量和夜雨最多的地方。雅安秋季总云量平均高达9.2-9.3成(全天有云量为10),夜雨率甚至超过80%,多到“巴山夜雨涨秋池”。夜间云雨既多,月亮自然比太阳更加难见,大见到月亮自然理更吠月。

四川盆地月难见到什么程度?我们以中秋为例。1980年代有文章统计了成都1951-1980年期间的共30个中秋日天气,发现其中20年是夜雨,4年阴云无月,4年云层稍裂,月光微弱,只有2年云净天高,皓月当空。我在1990年代末统计了我国秋季最阴的“天漏”雅安46个中秋夜赏月天气,雅安20时平均总云量甚至高达9.6成。这46年中,有45年皆无月,只有1956年中秋夜奇迹般地几乎无云,老天爷总算赏了雅安人一次脸。

可是,实际上,即使在基本无云的沙漠地区,

月亮本来就是比太阳难见的。为了简化,我们只分析朔(初一)、望(十五)、上弦(初七、八)和下弦(二十三左右)四天。朔日及前后两到三天里,月亮在天被地球本身所遮,我们是看不见的;上弦日,日落时月亮正在中天,天亮时月亮落地平线,也就是只有上半夜能在西半天空见月;下弦日,午夜时分月亮在东方地平线升起,民歌不就在唱“半个月亮爬上来”吗?月亮升到中天时就亮了,也就是只有下半夜才能在东半天空见到月亮。所以如果以这4天平均粗略代表全月,那么我们大约只有一半时间能见到月亮,见到的平均面积是半个月面。以大见怪而吠的性格,见到这种出现机会既少,又形状、面积经常变化的月亮,岂非更要“蜀犬吠月”?

最后说到,既然“蜀犬吠日”不是事实,“蜀犬吠月”只是“事后诸葛亮”,那么当时为何没把符合事实的“粤犬吠雪”流传下来,反把不符事实的“蜀犬吠日”流传了下来?因为“蜀犬吠日”和“蜀犬吠雪”同出一文,同时流传,甚至已经出现“蜀日越(粤)雪”这样的新成语。

根据我的粗考,问题主要可能出在明代的《幼学琼林》。《幼学琼林》在古代是极为广泛流传的蒙学读本,影响很大。它在选编形容“比人所见甚稀”的成语时,受文体所限,只能选一,因而选了“蜀犬吠日”而非“粤犬吠雪”,因而后人一般就只知道“蜀犬吠日”,而少知或不知“粤犬吠雪”了。

可见,这是历史的误会:柳宗元根据“粤犬吠雪”误推出了“蜀犬吠日”,《幼学琼林》的编者又误信了柳宗元而选择了“蜀犬吠日”。他们的错误都是因为缺乏调查研究。当然,话也要说回来,成语毕竟是文学,文学允许夸张。鲁迅先生在评论李白夸张形容的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时说过,“(文学作品)只要有些真实性在里面就可以了”,毕竟燕山是有雪的。我想,我们对“蜀犬吠日”成语也应如此。



文心走笔》》

让身体和心灵一起旅行

越过喜马拉雅山脉,飞机平稳降落在加德满都国际机场,眼前风景如画,蓝天映衬着红砖房,一派田园风光。机场在半山上,沿着公路蜿蜒而下,两边是农家自盖的房子,三三两两,没有哪两座房子是一样的。进入市区,仍然如此,只是密集了些。破旧的门面经营着各种商品,破旧的公交车上塞满了人,路边随处可见垃圾。

这是我到尼泊尔的第一印象,贫穷落后。接待我们的导游是个尼泊尔本地小伙子,中国名字叫成功。成功聪明热情,在石家庄学习了一年中文,交流和讲解就已经很溜了。来到加德满都广场,参观老皇宫和集合成群的寺庙。每逢他们的周六——每周就这一天是法定休息日,每座寺庙前的台阶上几乎坐满了休闲的人,或聊天或发呆,显得游手好闲。街道上仍然随处可见垃圾。

对尼泊尔的第二印象,是脏乱差。唯一的心理安慰,是遇上一个好导游。中国人的馋是走到哪吃到哪,看见街边卖小吃的小摊,馋虫就开始发出信号。成功不让我们吃,理由是怕我们拉肚子。待游览完毕,成功带我们穿过一条小巷,来到一个别有洞天的天井。一排颇有规模的摊档前挤满了尼泊尔人,卖小吃的人都戴了一

次性手套。成功问大家吃什么,他请,他知道我们身上没有卢比。我们很不好意思,点了几样,大家一起去尝了。给他钱,他不肯要,一直强调东西很便宜的。从加德满都到博卡拉约200公里,却要走近6个小时,盘山不好走是一个方面,但路不好是主要原因。我被沿途的农家生活吸引,零落散落的房屋,房前屋后的菜园,屋檐下三两个人坐在小板凳上乘凉。这是尼泊尔人的生活常态,休闲,安逸。

博卡拉海拔低,我们顺山而下,沿河而行。中途吃饭的餐厅就在河边,朝河岸走去,有一群穿着民族服装的尼泊尔女人,坐在凉棚下。语言不通,只能远远拍下这一幕,希望没有冒犯到她们。谁知她们对我们微笑,示意我们继续拍。于是,大胆地和她们合影,给她们看照片,她们从相机显示屏上看到自己,兴奋得你一言我一语。

巴德岗距离加德满都12公里,古城内有很多神庙,居民还保留着中世纪的风俗习惯,和丽江、凤凰相类似,唯一不同的是,商业化并不成熟,民风依旧淳朴。正巧赶上了他们的节日,自发的乐队在街道上游行,人们端着装有大米和花瓣的贡品敬神,好不热闹。

突然回想起加德满都广场上坐在寺庙台阶上的人,也突然嘲笑起自己的狭隘——尼泊尔全民皆有信仰。那么,在休息日来到寺庙瞻仰,安静地坐在台阶上与神灵亲密接触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。

在一座神庙前的广场上坐下,身后来了几个孩子,大的不过七八岁,小的三四岁。我举起相机,他们开始摆各种姿势,他们喜欢拍照。看着他们并不合体的衣衫又旧又脏,我问成功,能给他们钱吗?一定不能给钱。成功带我去买了一兜巧克力,回到原地分给刚才的那几个孩子吃。此时又围上来

一群孩子,我就一个一个分给他们。这时来了一个尼泊尔人,驱赶这些孩子,然后比划着尼泊尔语。原来这些孩子是职业乞讨者,这个尼泊尔人特意过来提醒我们不要上当。我问成功,他真好,他是导游吗?成功说他只是对面那个商店的老板而已。

走进尼泊尔,在加德满都穿梭于古老的神庙而忘记了时空;在博卡拉乘滑翔飞机冲上云端看雪山;在杜利凯尔住山顶度假屋看山雨欲来和雨过天晴。然而一切的一切,都不及这趟心灵的旅行深刻。虽然基础设施落后,公共卫生条件不佳,但这个人人皆有信仰的国度,能给人以温暖和爱。



走过草原(摄影)

苗青

桂子漫笔

文·胡一峰

儒者的侠气

在金庸先生的著名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中,大侠郭靖对杨过说过这么一段话:“我辈练功学武,所为何事?行侠仗义,济人困厄固然是本份,但这只是侠之小者。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‘郭大侠’,实因敬我为国为民、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,……只盼你心头牢记着‘为国为民、侠之大者’这八个字,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。”这段话的高明之处在于,淡化了“侠”的武力甚至暴力的影子,使“侠”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。

在中国文化中,侠和儒历来是相通的。《韩非子·显学》中说,孔子死后,儒分为八个流派,其中之一为“漆雕氏之儒”。“漆雕之议,不色挠,不目逃,行曲则违於臧获,行直则怒於诸侯,世主以为廉而礼之”。据说,这一派善于“养勇”,是儒者中任侠的代表。

国学大师章太炎专门写过一篇《儒侠》,对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“侠者无书,不得附九流。然天下有亟事,非侠士无足属。”他说,儒者之义,无过于“杀身成仁”;儒者之用,无过于“除国之大害,匡国之大患”,而这些,也正是侠者的追求。儒与侠,二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,其真义就在于对基于人性的道义准则的恪守,以及对群体多数幸福的捍卫。

世之真儒、大儒大都有侠义心肠。章太炎本人就是如此。1903年,因为在《苏报》上撰文斥责光绪帝“裁撤小丑,未辨菽麦”,章太炎被清廷缉捕。当巡捕来查捕章太炎时,他并没有匿名躲藏,而是迎上前去说:“余人俱不在,要拿章炳麟,就是我!”辛亥之后,袁世凯窃取革命又妄图复辟,章太炎“以大勋章作扇底,临总统府之门,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”,鲁迅称赞“并世无第二人”。章太炎去逝时,有一挽联写道:“经学驾唐虞而上;其在儒侠之间”,盖指论定,可谓恰如其分。

太炎先生学问高,名头大,一生多次授帽授徒,



刘文典